

先父臧启芳堂堂中国人

作者：臧英年

(上接2018年6月15日第B4版)

先父臧启芳主掌东大校务长达十年，是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任内也面临了东大多次迁校（北平到开封，到西安，到三台，返沈阳）和长期办学的严峻考验。他对东北大学的存在和发展贡献良多：

一是临危受命，继往开来。张学良在1936年西安事变兵谏后遭受软禁，东大失去领导，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停办东大的声浪已风云大作，此时先父坚持立场，力陈东大不能停办的理由。后经挚友齐铁生推荐，上峰同意，先父于1937年1月接掌东大校务，离开江苏省无锡区督察专员任所。这既是一个维持东大继续生存的要务，也是一个引人指责的根源。有些东北人士，包括东大师生，认为这一任命是中央政府要从张学良手里抢走东大的指挥权，用CC派（注：指国府要员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背景的先父介入，达成任务。殊不知先父不是求名求利，而是用心良苦地要维持东大存在，让家乡子弟有就学和栖身之所。先父曾在陈果夫（时任江苏省主席）麾下任职，这是陈氏有知人善任之贤，而非自成派系之私。（那时日本已霸占东北，陈氏乃启用先父和王德溥等东北名士在江苏省任职，先父在江苏先后主政盐城和无锡两行政督察区，政绩良好，市民称庆。）

东北大学面临第二次存亡危机是东大于1937年在西安立足后，又有上峰指令东大西迁到青海的蛮荒之地，果应命实施，大多数教职员裹足不前的，东大的命运也自然中止了。先父的应变措施是及时在四川三台获得了当地县长郑献微的支持，而迁校入川，先斩后奏，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也获得教育部的追认。这一奋斗的成功又来之何易呢！总之，先父要维持东大的存在，是志在必成，尽其在我的。

二是唯才是用，公正透明。先父掌校任职的准则是：“我聘请教授一向无领域之别，我所求的是学问品格，不问他是哪校出身，哪省人士、哪国留学。”这可以在东大先后任教的教授名册中看出来。此一准则导致群贤毕至，饱学之士纷纷到来，使东大成为众多优秀学人的荟萃之所，让学生们获益匪浅。有名师在校，东大教学和研究的领域也不断发展，让东大在抗日期间进入国内一流学府之列。

三是百鸟齐鸣，百花齐放。先父全

心全意在学校提倡思想开放，学术自由。各种社团和活动，各种观点和展示都蜂拥出现，各擅胜场，不一而足。拥有见识和勇气，才能创造这种风气和环境。再有，1943年东大首先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有数十位同学弃笔从戎，加入了青年军，其中也包括了正就读东大的我的大哥臧朋年。

四是清廉正直，树立校风。先父以身作则，不贪一分钱，不做一点假。每逢上级检查单位到东大查帐审阅，都是帐目分明，一丝不苟，迅速查明，圆满结束。那时，校长之职也是收入菲薄。在三台八年的抗日期间，家中变卖了以往收藏的略有价值的物品，补充家用。家母手存的一些金银饰物也全部投入“献机救国”的行动里。

五是事成身退，有始有终。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父以东大校长、教育部特派员和东北行营教育处处长三重身份前往东北，接收东北教育设施和恢复教育运作。只可惜那时国共内斗已经爆发，接收大员，先父除外，大多滥权贪腐，这便也加速了国府失败，退守台湾的进程。先父见大势已去，难以作为，便于1947年4月辞去东大校长之职，再于1948年12月率未成年子女过上海，迁厦门。1949年6月告别大陆，渡海赴台了。

在东北大学兴衰的过程里我们看到国家和社会的大环境对教育的发展可以产生“助成之”和“摧毁之”的重大影响。而国家主政者、教育工作者和学校师生有真知灼见、责任感、认知感和奋斗精神也可以达到弦歌不辍，排除万难，教育发达和国家振兴的良好结果。

抗日胜利后，先父回东北任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职务，在兵荒马乱之中，他老总是廉洁自守的倾尽全力为东北教育的前途奋斗，尽管是由于整个大局的牵制，未能成功，但已一本为国效力的初衷尽心竭力了。1948年东北已由共军掌控，父亲则正在南京出任教育部委员并兼任财政部顾问职务，他靠薪水维生，入不敷出，便去政治大学授课，增加收入。那时，他老人家已是闲散之身，为国家尽力的机会也有限了，唯念及东北青年纷纷入关，生活十分困难，乃遵从当时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先生之嘱，尽力研究提供救济东北青年的方案，就爱护青年来说，先父最乐意采取行动，全力以赴。

1948年年底，我们举家迁往上海再



一九三八年臧启芳（前左二）与蒋介石（前左四）等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时的合影。（图源：独立中文笔会）

迁厦门，因经济困难，除先父因公得乘坐飞机飞赴厦门外，祖母、家母、弟妹和我等均坐先父生前好友萧碧川先生一艘仅百余吨的机帆船，免费搭乘自上海前往厦门。船沿近海航行，一路飘飘摇摇，历时半月，始到达目的地。途中几乎遭遇抢劫并曾有翻船之险，至今思来犹有余悸。

在厦门时，先父为了谋生，创办了一所为升学大专作准备的“大同补习班”，与前北洋大学校长李书田先生分授国史和数理课程。当时，由于水源缺乏，买水费用昂贵，先父就命我去一里以外的水井挑水回家，而我面现难色，因那时我正读高中二年级，以往既没有挑过水，也生怕挑水时碰见同学让自己丢脸。先父看见我有此顾虑，便恳切地说：“凭个人劳力谋个人生计是光明磊落的事情，有什么可害羞的。我知道你没有挑过水，体力也差，不妨挑挑歇歇，总可以挑到家。你就一大早或是深夜里去挑。那时路上行人少些。在家中经济困难的时候，你能尽一分力量协助解决家里的问题，自己也会觉得骄

傲。”于是我俯首秉训，欣然前往，很快地，我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业余挑夫”了，按着扁担起伏的节奏迈着步子，全程中只要歇一回脚就可以把水挑回家了。

1949年下半年已呈现国共内战国军溃败的必然局面，我们全家于1949年6月下旬从厦门渡海赴台，全家落户于台中市。

先父赴台之后，鉴于台湾志气消沉，惶惶不可终日，乃振笔疾书，其文章则以真实姓名投递港台等地之报章杂志发表。当年冬天，便创办了“反攻半月刊”杂志，是为台湾倡言自力更生、自强应变和推行民主的一份杂志。这和当时存在的“自由中国”杂志（雷震在台主办）和“民主评论”杂志（徐复观在香港主办）鼎足而三，是力倡施政图强和民主政治的先锋之声。

——待续——

（本文受版权保护，未经作者或本报许可，不得转载。）